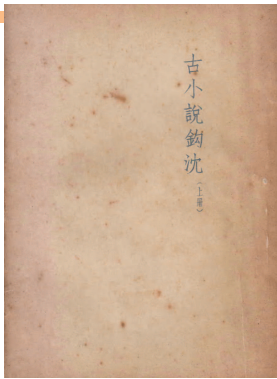


鲁迅《古小说钩沉》究竟辑录于何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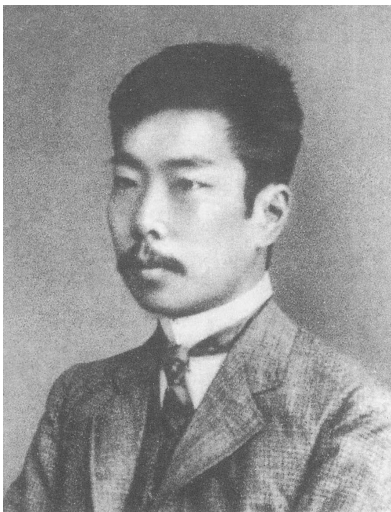
■ 翁长松

鲁迅辑录的《古小说钩沉》(又名《古小说钩沈》),全书共收录自周至隋的散佚小说 36 种,取材来源广泛,有见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隋书·经籍志·小说家》《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也有见于上述三种志“小说家”之外著录,还有不见于史志著录者。书中引用及用以参考的古书共 80 种左右,所辑内容非常丰富,而且鲁迅在小说的取舍和甄别上又非常审慎,去伪存真,甚至对同一书名、不同朝代和作者的作品也进行了精准的抉择。像《述异记》,曾出现过南朝齐祖冲之、南朝任昉、清代东轩主人三种不同年代、不同作者、不同内容和版本却是同一书名的小说集。鲁迅凭借其厚实的古史学识和文学功底,在《古小说钩沉》中选择和辑录了出现最早、小说史价值也高的祖冲之撰写的《述异记》。这本南朝志怪小说集《述异记》叙述了晋宋(南朝)事,内容丰富而且涉及博广,各种习见的志怪题材多有反映。在细节描写上,刻画入微,已摆脱早期志怪小说粗陈梗概之俗,对唐传奇有较大影响。可见当年 30 周岁的鲁迅在古小说选读和鉴赏上已造诣颇深及很见才识。

然而,《古小说钩沉》在鲁迅生前一直没有印行,直到 1938 年编印《鲁迅全集》时才初步整理出版,被编入第八卷,但新中国成立



▲《古小说钩沈》,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 年 10 月北京重印第一版



▶ 1909 年鲁迅在杭州时摄

后出版的《鲁迅全集》(10 卷本与 16 卷本)未收入该书。其单行本有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 1939 年的初版本,195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该初版重印。笔者收藏的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 年 10 月初版重印本,全书上下两册,共计 543 页,印数 2000 册,定价 20,000 元(旧人民币)。上册辑录《青史子》《语林》《小说》《列异传》《古异传》《甄异传》《述异记》《灵鬼志》《神怪录》《神录》《齐谐记》《幽明录》等 18 种,下册辑录《鬼神列传》《志怪记》《汉武故事》《异闻记》《玄中记》《杂鬼神志怪》《祥异记》《冥祥记》《旌异记》等 18 种,合计 36 种。该书内容广博丰

富,又奇异荒诞,涉及古代社会礼仪、帝王琐记、神仙故事、讽刺幽默、神话传说、鬼怪传奇、社会见闻等方面的故事传奇等。读了鲁迅的《古小说钩沉》,诱发了笔者再次翻阅《鲁迅全集》(18 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 1 月印刷本的兴趣,然而遗憾的是,未见《古小说钩沉》的文本,只在《鲁迅全集》第十卷《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中见到一篇典雅精湛的《〈古小说钩沉〉序》。

在关注和欣赏这篇序文的同时,笔者还发现了这篇序后附的注释,曰:“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点。最初以周作人的署名发表于 1912 年 2 月绍兴刊行的

《越社丛刊》第一集;1938 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八卷《古小说钩沉》中未收。《古小说钩沉》,鲁迅约于 1909 年 6 月至 1911 年底辑录的古小说佚文集,共收周《青史子》至隋侯白《旌异记》等 36 种。1938 年 6 月首次印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全集》第八卷。”读了上述注释,笔者对其中涉及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的时间节点,有些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辑录《古小说钩沉》的开始时间与其说是 1909 年 6 月,不如说是 1910 年秋更为确切和妥当。大家知道鲁迅于 1902 年 4 月东渡日本,1909 年 7 月从日本回国,结束了前后七年的留学生活。鲁迅回到国内后,为了谋身和资助兄弟及家人,急于找工作,无暇顾及其他。后在友人许寿裳先生的推荐下才进入坐落于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职,主要担任初级师范的化学和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学,此外又兼任博物学(植物学)的翻译和教学任务。面对繁琐的教学任务,这时的鲁迅忙于备课和编写讲义,几乎所有的文学活动都不得不暂时停顿了,并没有时间去做费时费力的古小说收集、研读和辑录工作。即便有课外时间,为了完成好眼前植物学的教育任务,他往往忙于和学生们一起上孤山、葛岭、北高峰一带去采集标本,为深化学校

的教育实践活动服务。

1910 年 8 月,应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创办人蔡元培的邀请,鲁迅离开杭州回到故乡绍兴任教。1910 年秋季开学的时候,他在绍兴府中学堂做学监,并兼任博物学、生理卫生学教员。他几乎是重操旧业,不需要再备课和编讲义了,比起在杭州的教学任务也轻松多了,也才会有足够的时间去从事他嗜好的古小说收集和辑录工作。《鲁迅全集·鲁迅生平著译简表》中有记:“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庚戌)三十岁。七月,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职,回绍兴。九月,任绍兴府中学堂博物学教员,兼任监学。本年,在授课之余,开始辑录唐以前小说佚文(后汇成《古小说钩沉》)及有关会稽的史地书。”鲁迅 1910 年 11 月 15 日致许寿裳信中记道:“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王士菁在《鲁迅传》中也谈及:“1910 年秋季开学的时候,他就在绍兴府中学堂做学监……辑录唐朝以前的有关绍兴地区的地理和历史的著作和唐以前的小说,是当时鲁迅所从事的另一个重要工作。这就是后来印行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古小说钩沉》的发端。”所以,笔者认为鲁迅是在 1910 年秋季至 1911 年底辑录和完成了这本《古小说钩沉》的,这也为他后来讲授和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基础。

(上接第一版)

呈现个人记忆中那些鲜活的历史细节

苏州大学教授罗时进指出,近现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变”时期,事件连着事件,事件叠加事件。由于事件性突出,看似容易研究,但事件纠缠复杂,深入研究的难度其实很大。无论如何,正确阐述和定义“近现代”离不开文献史料。近现代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从郑振铎、阿英那一代学者就开始做了,研究机构很多,投入力量很大。但近现代史料浩如烟海,需要不断发掘,持续整理。对近现代的历史、文化、文学的发展变化,已经有了一个认知框架,这个认知框架是否完全可靠,是否有修订的空间?非系统、非重大的史料也许只有补充作用,但系统性、集成性、重要性的史料,必然形成对以往认知的反思、质疑。此丛刊的编纂目的,显然不在于推翻什么结论,改变什么观点,而在于强化近两百年的家国记忆,丰富近现代的生活图像。但客观上,随着整理工作的推进,必能促进研究,将会使过去的某些认知得到改变,认识得以完善。

对于以日记与函札作为出版重点。罗时进认为,日记和函札在近现代越来越具有“个人史记”的性质,尽管其中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修改的痕迹,但仍然能够通过个人记忆反映出家国历史和日常生活:“我们随手翻阅此次出版的一些日记,感觉人生的道道隙缝中有真性情,也能从他们读哪些书、思考哪些问题、营造怎样的人际圈,见其学识修养与人格形象。”

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认为,以稀见史料为前提,出版这样一套近现代重要文化人物的著作是非常好的做法,而其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从中可以看到近现代人物各种各样不同的个性,各种各样不同的棱角,比如《高心夔日记》。

陈尚君觉得第六辑里面最重要的一部是《高心夔日记》。而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在祺祥政变之前,高心夔有一年半时间在肃顺的家里做家庭教师,所以他详细记载了肃顺的待人接物和日常处事,以及他听到祺祥政变肃顺下场以后的震惊。高心夔把他的感慨直接地写了出来,是一段情绪很强烈的评价。陈尚君说这一段太重要太精彩了,他之前仔细看过文史里面有关祺祥政变的详细研究,但印象中,当时并没有用到这个材料。现在从《高心夔日记》来看,祺祥政变中,肃顺等人根本没把慈禧那个小女子看在眼里,没有想到慈禧可以果断地把皇帝的大臣给一锅端掉,这完全是出乎他意料的,肃顺完全是大意了,他以为八大臣是先帝拜托的,是非常稳定的,他没有想到会走到这样的境地。所以这篇日记真的是太重要了。

陈尚君还将中国与日本进行了比较,认为在近现代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日本。他指出,对于文献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可以让近现代史做到更加丰富细致准确。

同样以《高心夔日记》为例,复旦大学教授陈引驰高度赞扬了编辑所做的索引工作。他指出,日记比较零散,没有索引看起来不方便。比如张剑在《高心夔日记》“整理前言”中说高心夔脾气不好,跟他的兄弟关系好像很紧张。陈引驰读到时就

这是什么人,然后就去查后面的索引,发现这两兄弟在日记中不断出现,大哥很厉害,兄弟要吸鸦片,他发脾气把兄弟的烟具全部毁掉。所以有了索引,再顺着这条线去看,还蛮有意思的。

陈引驰同样觉得日记书信很重要:“专业学者可以看到里面的第一手材料,虽然也有问题,但要做研究的话仍是最可以依凭的。”

通过史料还原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本真状态

丛刊第六辑主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彭国忠告诉记者,坚持稀见性、开放性、丰富性和学术性是他们编纂这套丛刊一以贯之的原则:

稀见性,包括文献的存世量、关注度和自身价值,如果仅仅少见而无价值,是不会被纳入丛刊的。

开放性,是指选题的开放性,中国近现代史料浩如烟海,有不少文献根本不见于公家收藏或已有目录中,无法提前开列一个编排有序的书单,而这恰恰是从刊的丰富性和魅力所在。任何预定的、一成不变的目录,在丰富多样的文献事实面前都将显得苍白、浅薄;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一部有价值的书,是编辑的期待,也是编辑的经验。“所以,单凭我们几个主编到图书馆、资料室翻检、查索文献远远不够,任何交友、任何学术同人愿意加入文献整理队伍,我们都欢迎;任何有益的建议、线索我们都采纳吸收。”

丰富性,除了指史料形态的多样性——它以近现代稀见日记为主,而尺

牍、奏议、笔记、诗文集、金石序跋等等皆在内,更主要的是,丰富性与编辑对史料的理解有关。“我们认为,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宏大叙事的文本固然是史料,关涉人物的生平、思想、性情的文字也是史料,人物的读书、思考、交往、应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史料。历史建立在人物和事件之上,人物、事件是鲜活的、生动的、多样化的,因此,记载人物、事件的史料具有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而历史,写在纸上的历史,只是阐释的一种,是历史学家的一种建构。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史料还原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本真状态,还原它的生动性、丰富性;是为不同的史家提供无限的阐释可能。钱穆先生说中国亟须新的历史知识时,考虑的是‘昔人所宝贵获得之知识,吾人或嫌不切当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寻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就史料而言,我们于此还要加上一层:他人所获得者宝贵者,未必切于己用;自己所需要者、关注者,可能正是他人所漠视者抛弃者。”

学术性,一指史料的学术价值,这是这部丛刊的质量保证,基本上每部书主编都会和编辑一起讨论,甚至反复辩论,才能确定纳入。二指对丛刊学术价值的开发。从第四辑开始,编辑部就在新书发布的同时,举办学术研讨会,围绕着丛刊中的史料进行学术研究。三指几位主编就某一史料自己撰写学术文章,或就某一专题组稿。

彭国忠曾经说过,整理文献是一件“有过无功”的事情,但他们仍愿意“乌鸦反哺”,尽绵薄之力,对学术界进行回报。这样的回报,他们持续至今,并砥砺前行。